

# 专题研讨:中国哲学从业者的素质问题

主持人:南京大学哲学系 李承贵教授

编者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呈多极、纵深发展之态势,学术成果不断问世。然而,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相关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中国哲学从业者的素质问题就是一个很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中国哲学从业者应如何提出问题?中国哲学从业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哲学从业者需要怎样的素质?等等,都是当下中国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里编发的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表示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和理解。希望以此为契机,引起学界同行对此问题的关注,从而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健康、科学而富有成效地开展。

## 以传统和当代的交接点为视域

——略谈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体会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代孟浩然有诗曰:“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自1978年考上研究生,师从冯契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先生曾多次教诲:“不能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至今谆谆之貌犹在眼前,然反躬自问,愧对师门,在学术上成绩寥寥。唯一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三十年来自己始终没有离开学术研究领域,因而多少还能谈点研究的心得体会。

当时报考研究生时,招生目录上规定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哲学史。进校后,写的硕士论文是《“五四”前后胡适派“科学方法”的再评价》(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哲学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样我基本上就以研究中国近代哲学为主要方向了。三十年来,自己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体会,归结起来就

是:以传统和当代的交接点为视域。

比较自觉地以此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视域,与1980年代有关文化传统的讨论有关。在这场讨论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儒学传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包袱,只有彻底地抛弃它,中国的现代化才有成功的希望。另一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认为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步履艰难,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儒学传统)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从而无法有效地使传统文化转换为支援现代化的思想财富。这种观点是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上述的“包袱”论和“财富”论貌似对立,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仍然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否则,就不可能成为“包袱”,也不可能成为“财富”。那么,这个前提是否是既定

的存在呢?

传统文化在古代中国产生影响力,主要有以下三个环节。首先是思想观念。传统文化以典籍为重要载体,人们正是通过对这些典籍的不断讲授、领会和阐发,使得其中的思想观念一脉相传。其次是行为方式。大多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主要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行为方式的训练,即以“礼”为规范自身行为的准则。再次是语言传递。古代汉语(文言)的特点是言约义丰,它的字、词有多重的意义,在同一词语里积淀了长久使用中所蕴含的各种情感。因此,随着语言的传递,传统文化的丰富情感也就得以为后人所接受、咀嚼、发展和引申。就以上三个环节而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当代中国社会不再把古代典籍奉为必读的教科书,“礼”也不再是行为的准则,现代汉语的教学也很少传递词语中的传统情感了。但是,我们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某些巨大影响。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此可以用个比喻:某个人的形体、容貌、体质等和其祖先的遗传因素有着一定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有经过这个人的父辈,才会对其发生影响。所以,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父辈”使得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发生了影响力?这个“父辈”是近代的思想文化。传统哲学的影响也是经过中国近代哲学而对当代中国产生影响的。

因此,以近代哲学为传统和当代的交接点,不仅是对研究近代哲学的意义的一种认识,也是研究近代哲学应有的一种视域。就是说,我们只有对中国近代哲学有充分的研究和深刻的把握,才能弄清楚传统哲学是如何嬗变的,是经过了怎样的改造和筛选使得某些传统消解、某些传统强化了;才能弄清楚当代中国哲学发生的历史背景,从而进一步明了当代中国哲学前进的方向。正是从这样的视域出发,我在有关论述中国近代哲学的论著中,比较注意揭示中国近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改造和筛选,以及这种改造和筛选对以后中国哲学的正面和负面的作用。从中国思想的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近代哲学作为传统与当代的交接点,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以明清之际的思想嬗变为先导的。因为这一时期的思想横亘在传统和近代之间,因此我把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有机部分。关于明清之际思想的研究,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明清之际是中国哲学的启蒙

时期,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类,是近代的曙光。另一种观点认为,明清之际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自我调整,只是日落西山时天空中的一抹晚霞。这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判断明清之际思想中的近代因素。“曙光说”充分肯定了明清之际思想的近代意义,但对其有所夸大;“晚霞说”较多分析了明清之际思想与传统思想观念的联系,但基本忽视了包含其中的近代因素。在对“曙光说”和“晚霞说”的合理成分和偏颇之处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我认为明清之际是中国近代思想的胚胎,所谓“胚胎”,就是说明清之际的思想表现出从传统过渡到近代的某种动向,但终究是个胎儿,没能发育为冲破母体而诞生的婴儿,但为近代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某些潜在的养料,因而它与代表新时代思想观念崛起的西方文艺复兴并不相类,也与原先的中国传统有区别。由“胚胎”说来考察明清之际与近代的内在脉络,实际上是对近代作为传统与当代交接点的历史追寻。就我的研究而言,主要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这个侧面来阐释“胚胎说”。以传统和当代的交接点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视域,在纵向上需要关注明清之际,在横向上最需要关注的则是西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的关联。中国近代哲学不同于传统哲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开始汇入世界哲学之中;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成为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哲学是由西方哲学催生的,但它又不是西方哲学的翻版,而是中国思想家自身的创造。这种创造在本质上是西方思想中国化的过程。所谓中国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就社会层面而言,中国近代是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西方思想之所以能影响中国,是由于它们总是在某种程度、某个方面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大变动的需求。就文化层面而言,是指它们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有着与其在西方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的面貌。

就文化层面来讲,西方思想的中国化过程始终贯穿着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是说西方思想的中国化,是两个“接着讲”的统一,即既要接续西方思想的理论,又要承继中国思想的传统。这里存在着三个有着内在联系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动相适应,中国人所青睐的基本上是西方的近代思想。这些西方近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时代性差异。这就决定

了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必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过程。没有这样的变革,西方近代思想无法在中国显示其影响。这样的变革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西方近代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变革,是为了使人们认同它。然而,对任何外来新的思想的认同,实际上是将其或多或少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否则外来思想就会被看作是纯粹从外国输入和强加的。所以,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自觉地融合传统文化。一般说来,两者的融合是以两者具有某种相通性为基础的。西方近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存在时代性、民族性差异,但由于两者所要回答的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共同的,因而对共同问题的回答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使得两者的融合是有可能的。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是将这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通、予以自觉地融合的过程中实现的。变革和融合这两个环节,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弃,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融合在变革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实现,同时也使变革获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和亲和力。无论是变革或者融合,都是以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把握)为前提的。理解总是在主体的“前理解”即原有观念结构的作用下发生的,而传统文化的观念或意识在主体的原有观念结构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传统文化作为主体的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也参与了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制约着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即传统观念或意识渗入到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中,使其打上传统观念或意识的印记。这种制约作用对主体而言往往是无意识的,但却是不能忽视的。通过影响主体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传统文化的制约成为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过程中与变革、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又一个环节。

以上大略地说了西方思想影响近代中国的一般性看法。在具体的历史的研究中把这些看法充分地体现出来,把其中的环节深入地揭示出来,是需要花大力气的。就我本人而言,主要是研究了西方的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想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

进化论在中国近代的中国化,是一个化外在为内在的过程,即把外来的具有世界观意义的科学理论演化为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具有科学

意义的崭新世界观。我借用传统哲学的“道器”范畴,将这样的化外在为内在的过程概括为:器道升替。具体来讲,“由器而道”——进化论思潮形成。进化论作为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属于“器”的范围,然而它一旦成了宇宙社会的普遍规律,则进入了“道”的领域。进化论思潮形成于戊戌前后,就是由器提升为道的过程。”“道之裂变”——进化论思潮的发展。同一进化论之道,与改良派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把进化论和革命相联系;把大同理想和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相联系;把破除经学和保存国粹相联系;这些不同体现了进化论思潮的发展。“新道代旧道”——进化论思潮的落退。新文化运动一方面依然崇信进化论,以此来批孔和倡导科学、民主,另一方面又在选择新涌进的“主义”取代进化论。在这一过程中,进化论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对文学、历史领域有很大影响,表现为即道即器;同时它又从世界观之道还原为具体科学之器。

这样的器道升替过程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变革、融合以及传统文化对进化论的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化论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导,因为进化论思潮演变的主流表现出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迹。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因此特别需要研究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得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发生影响力,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传统与当代之间最直接的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存在着上面所说的变革、融合、制约的环节,问题在于如何进一步展开这些环节。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是从以下四方面展开的: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继续和必然,由此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中国化的历史背景;第二、分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农民文化传统的关系,如果对此不甚了了,就不可能全面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与其传统文化结合的;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比较,揭示两者理论内涵上的异同,以论证两者具有的互补性;第四、探讨近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联,认为前者是以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改造为思想资源的,也是以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来淘洗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